

旧影留真

孙明经

—1939走进雅安

Sun Mingjing 1939 Walk into Ya'an

雅安市博物馆 编著

文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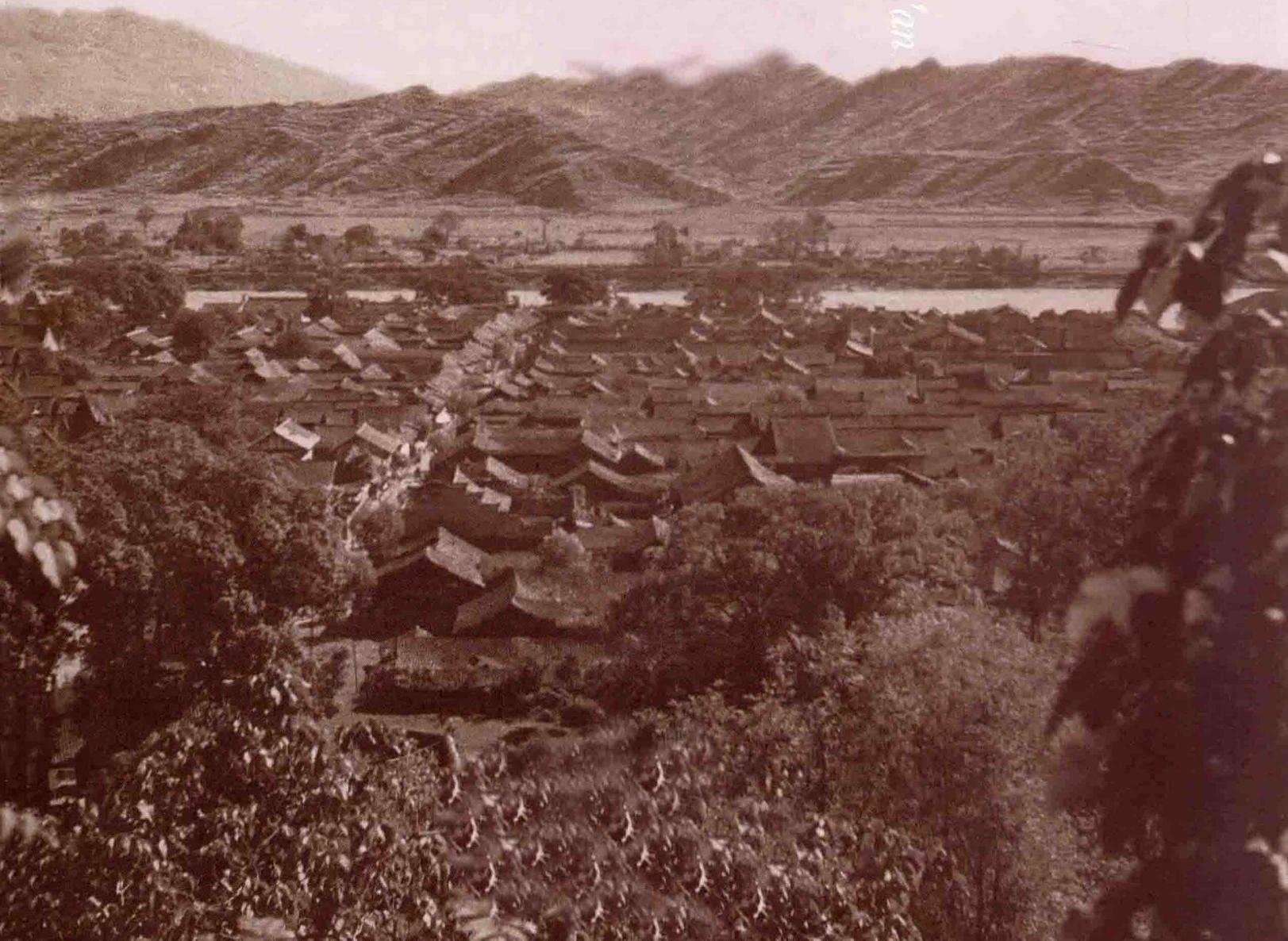


孙明经

1939走进雅安

Sun Mingjing 1939 Walk into Ya'an

雅安市博物馆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明经：1939走进雅安 / 雅安市博物馆编著.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10-3952-4

I. ①孙… II. ①雅…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
雅安市—摄影集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9509号

孙明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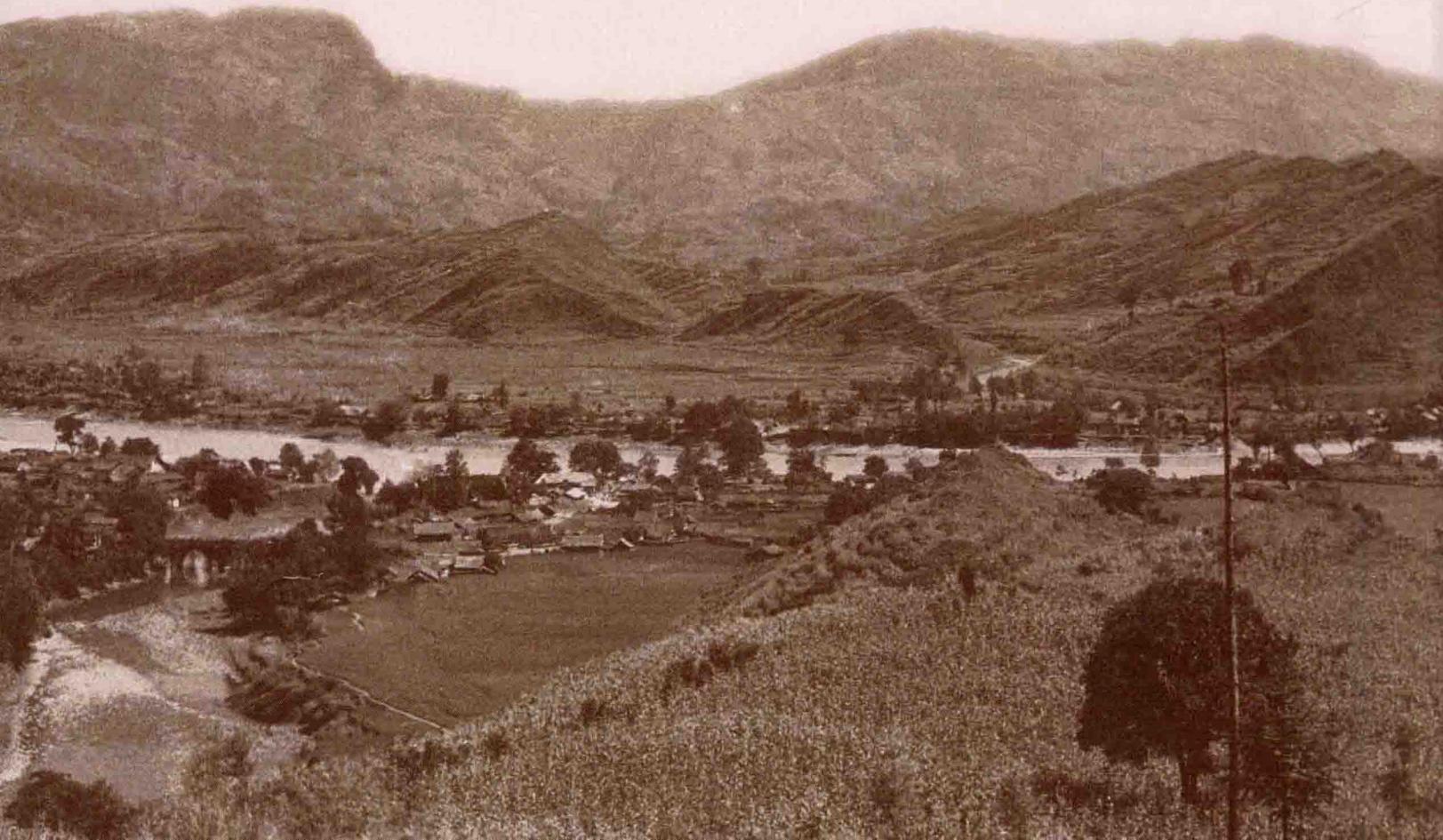
1939走进雅安

Sun Mingjing 1939 Walk into Ya'an

雅安市博物馆 编著

装帧设计 刘远
责任印制 梁秋卉
责任编辑 李缙云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制版印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0.5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3952-4
定 价 160.00元



目 录

Contents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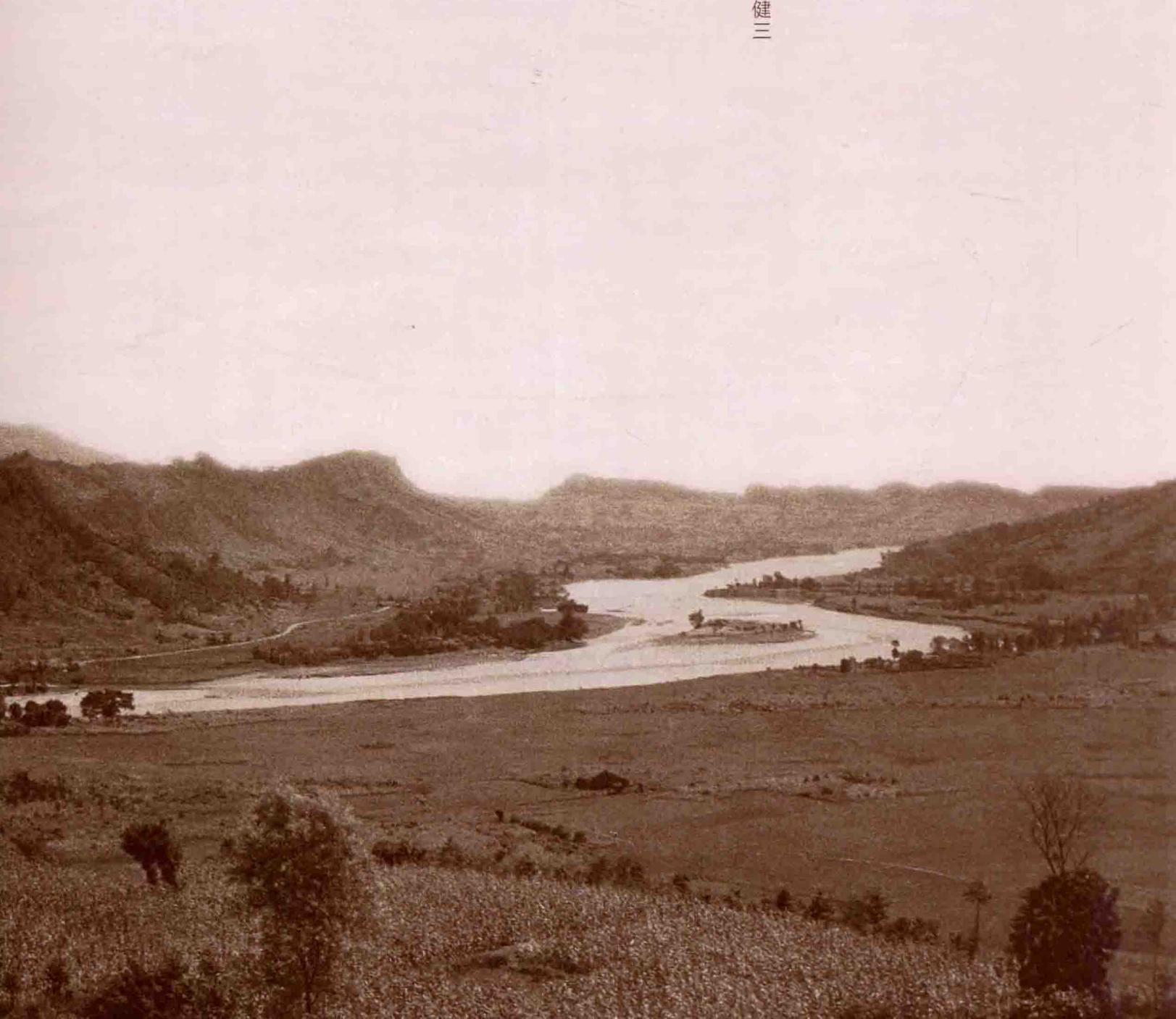
孙明经1939年的
「茶马贾道」影像考察

孙健三

023
图 版

164
后 记

孙华



孙明经

1939 走进雅安

Sun Mingjing 1939 Walk into Ya'an

雅安市博物馆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明经：1939走进雅安 / 雅安市博物馆编著. —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010-3952-4

I. ①孙… II. ①雅… III. ①摄影集—中国—现代②
雅安市—摄影集 IV. ①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9509号

孙明经

Sun Mingjing 1939 Walk into Ya'an

1939走进雅安

雅安市博物馆 编著

装帧设计 刘远
责任印制 梁秋卉
责任编辑 李缙云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编 100007
网 址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制版印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 10.5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3952-4
定 价 160.00元



目录

Contents

005

孙明经1939年的
「茶马贾道」影像考察

孙健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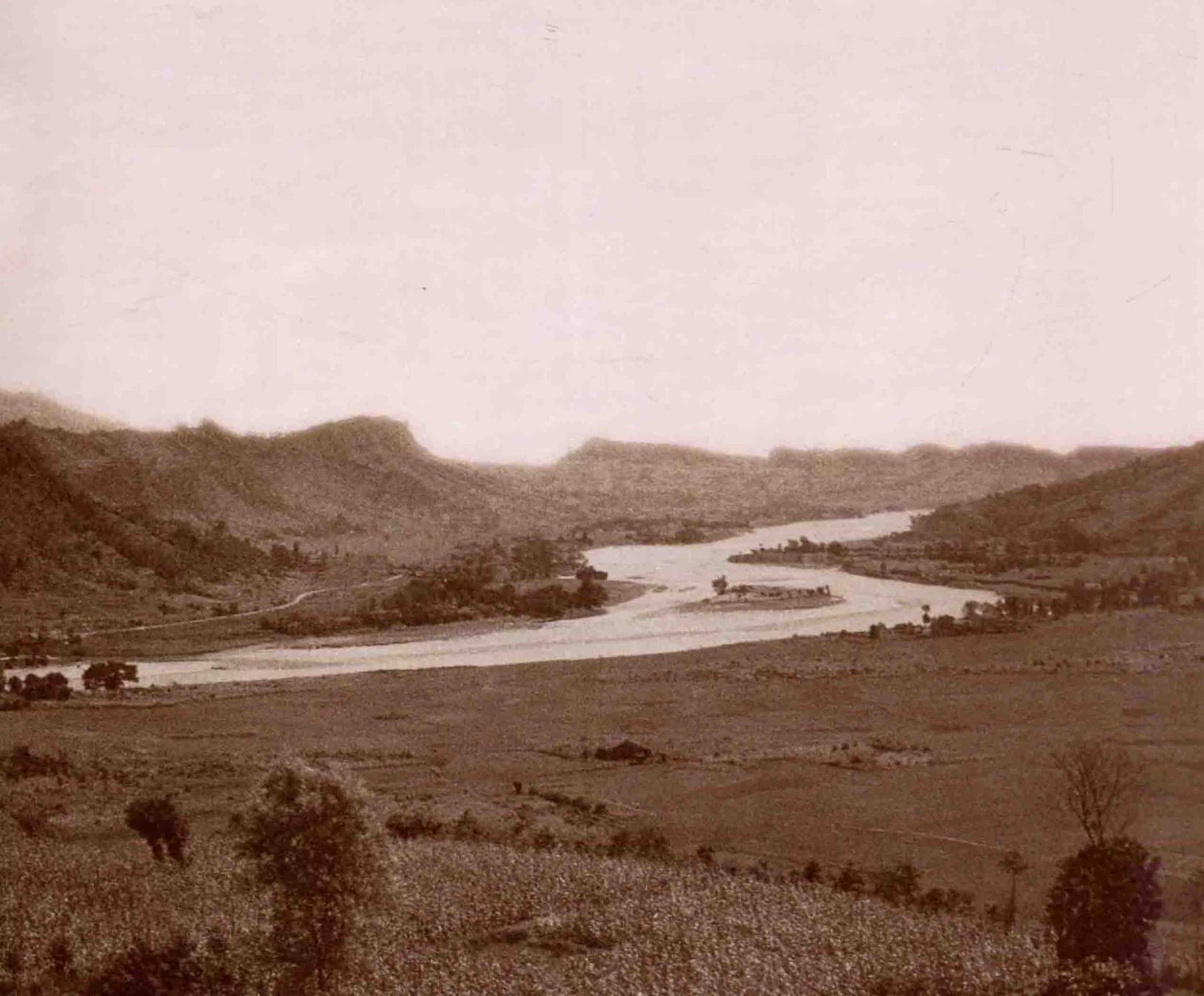
023 图 版

.....

164

后 记

孙华



孙明经1939年的
「茶马贾道」影像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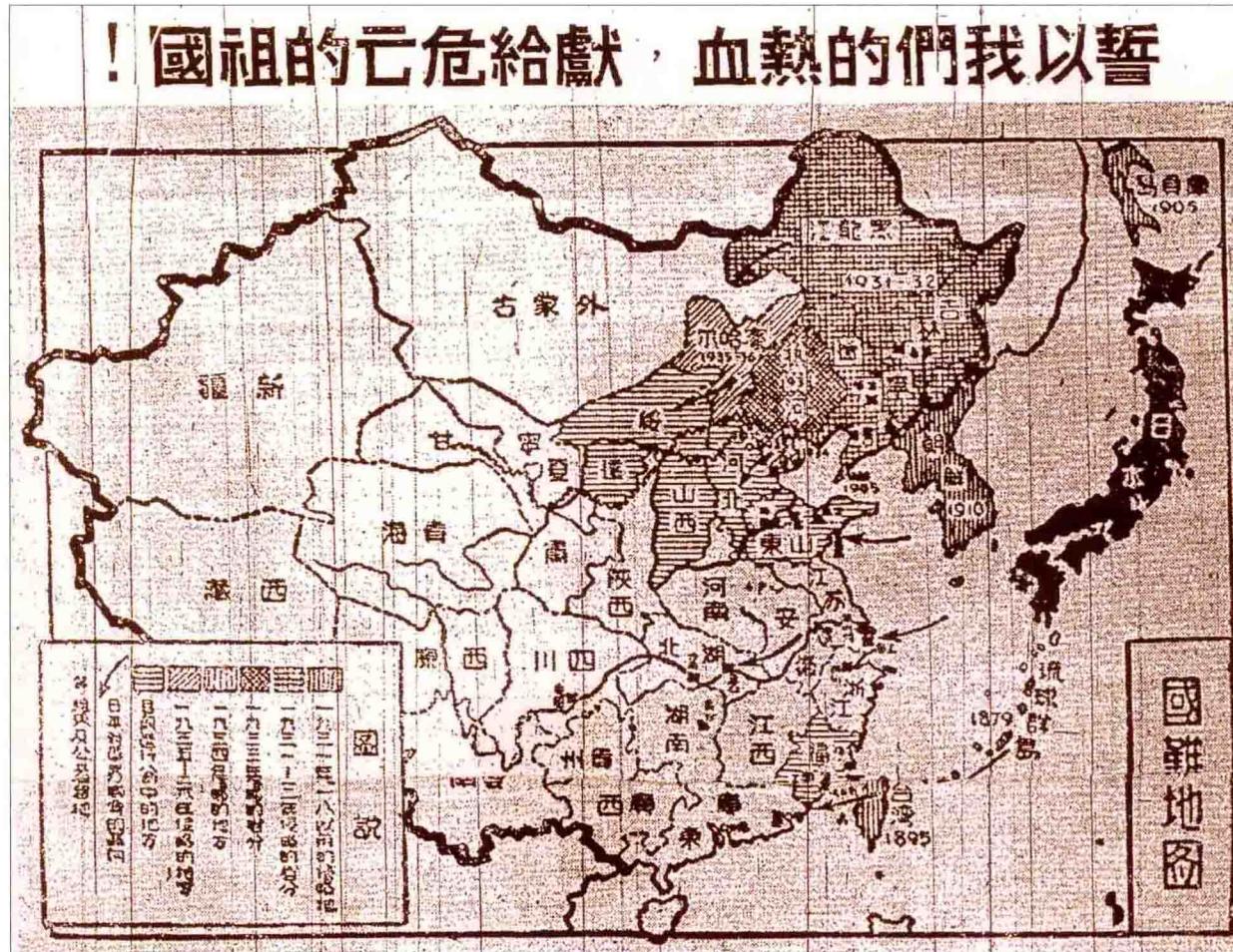
孙明经像

1939年，从6月初至12月底，历时160余天，一位28岁的年轻学者孙明经，带着数十位学界泰斗开列的课题，肩扛电影摄影机，手握照相机，翻雪山，涉激流，行程万余里，几经生死，完成了一次用电影活动影像和照片记录考察成果的“茶马贾道”科学考察。

孙明经为何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说：“孙明经老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我国电影摄影学首位博士生导师、孙明经的弟子沙占祥教授说：孙明经是“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¹。用孙明经本人的话讲：“我是一个教师、一个传播者、一个文化与教育思想方法的研究者传播和译荐者。”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1947年包括孙明经在内的120位中国学界泰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首批中国委员，同时孙明经还被联教组织大众传播委员会聘为中国委员。

孙明经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更是一位实证科学考察者。他走遍华夏大地，用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留下了大量中华文化的记录。34岁前，他进行过四次实证摄影考察，每次行程均超万里。36岁前，独立摄制了63部“十分珍贵”的电影，拍下了多达万余幅的科考照片。

¹ 沙占祥：《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的开山宗师——忆孙明经》，《时光留影：北京电影学院教师访谈录》第2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何钊、吕桓甲主编：《德艺双馨的艺术院校名师》，中国广播出版社，2007年。



图一

在四次万里科学考察中，特别是1939年6月从重庆出发12月底返回成都，历时160多天的“茶马贾道”考察，保留下了极其丰富和珍贵的动态影像及照片，为今天重新认知、研究和利用“茶马贾道”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带来了诸多宝贵思考。

国难与教育电影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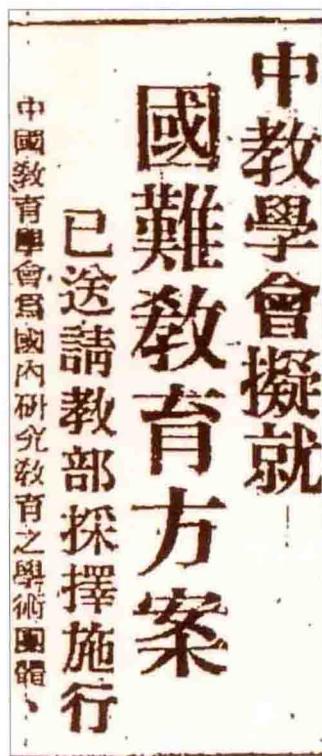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日本割占；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相继沦陷；1932年，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1933年，日军进犯长城一线，热河、察哈尔及河北等省相继被日军占领。1931至1933年，日军逐年加大对我国的侵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面对国土沦丧、同胞被戮，“救亡”成为当时全体中国教育者无一不呼的口号！要救亡，必须“唤

图一 国难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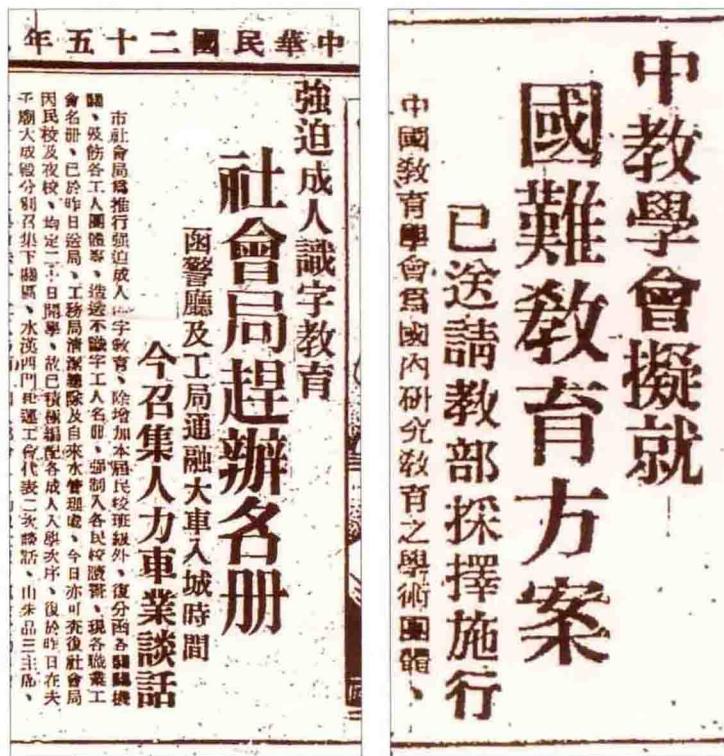
图二 1936年《南京日报》上有关当时我国开展强迫成年人识字教育的报道

图三 当时《南京日报》刊登的教育界提出国难时期教育方案的报道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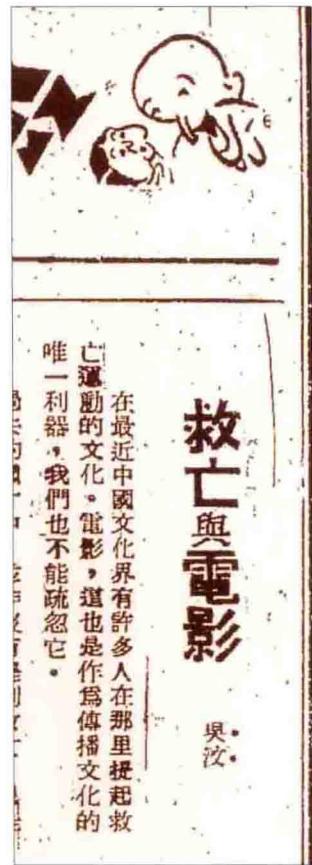
图四 提出“救亡与电影”的《南京日报》报道标题



图二



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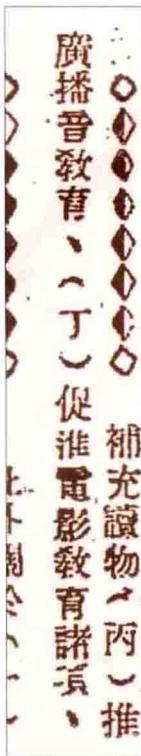
图四

起民众”！但现实却是“写了书，出版了报纸刊物，可百分之九十的同胞是文盲！”（蔡元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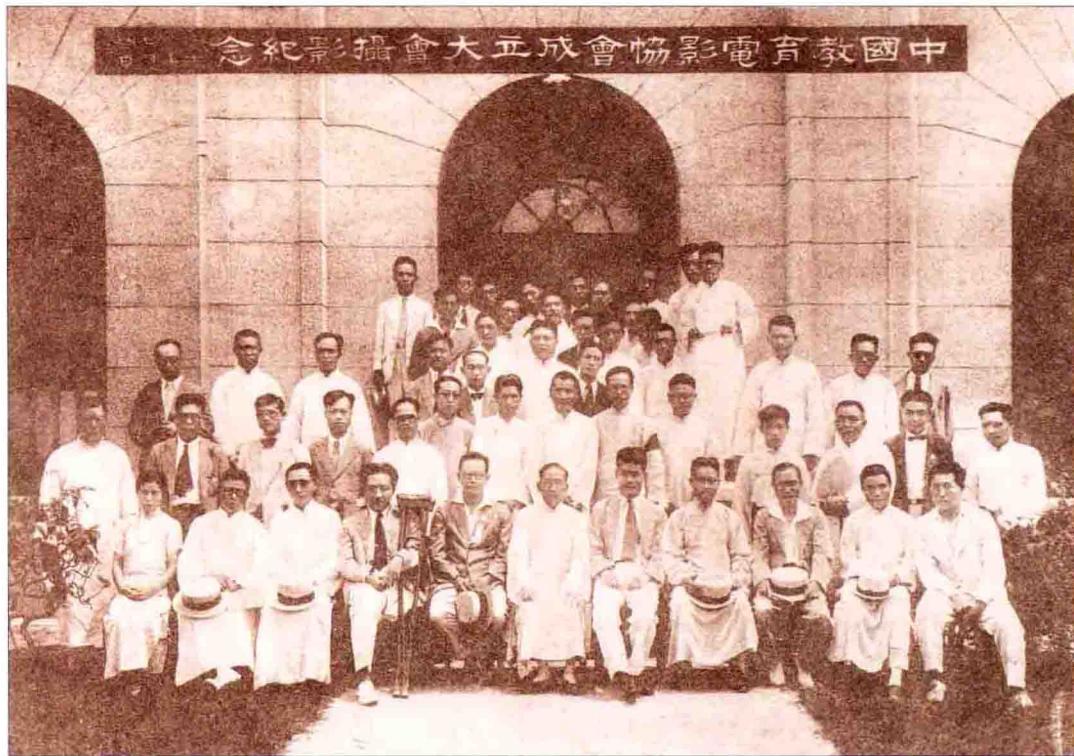
怎么办？中国的教育者们想出一个办法，大范围开展“强迫成年人识字教育”！一时间各式各样的执行方案纷纷出炉，可见当时教育者们的拳拳爱国之心。

面对重重国难。一方面“唤起民众群起救亡”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强迫成年人识字教育”却收效甚微，难于一蹴而就。该如何“救亡”？一时国人又举手无措。于是对如何实施“强迫成年人识字教育举措”和《国难时期教育方案》的反思与讨论成为那时中国教育者们最热议的话题。

面对这种现实，必须找到一种不用借助文字，并且能大范围、高速度、快见效的“唤起民众”的方法。而电影和图片直观易懂，便于宣传，正符合“救亡”时代的需求。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村的男女老少，无论是什么程度的文



图五



图六

盲，即使大字不识一个，只要电影和图片在面前一放，“救亡”的道理便了然于心。于是“救亡与电影”和“发展有声电影唤起民众的方法”便被提上了日程。

1931年，蔡元培、郭有守师生二人，在筹划推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幼立志“要一辈研究电影”的大学生孙明经。孙明经的勤奋与敬业，得到蔡元培、郭有守的赏识，二人亦将孙明经视为弟子和助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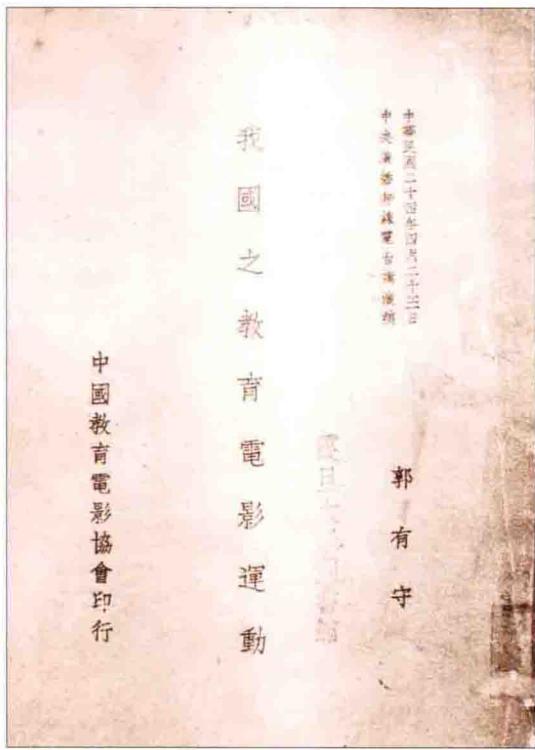
1932年7月8日，在郭有守、陈翰笙的发动下，由蔡元培担任第一届主席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内容丰富多彩的“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为“救亡”在我国正式开启。

在众多泰斗的指引下，孙明经的才华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的抱负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中也得到了施展。孙明经不仅拍摄了大量的优秀教育电影和照片，还成为了我国电影高等教育、摄影高等教育、播音高等教育、电视高等教育的第一位专职教师。

图五 1936年3月25日正式成为当时国家政策的“国难时期教育方案”的局部内容：“推广广播音教育”、“促进电影教育”

图六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大会合影（前排中蔡元培 孙明经摄）

图七 郭有守《我国之教育电影运动》封面



图七

二 “茶税救国论”促成 1939年的“西康考察热”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1938年，武汉失守，日军开始了历时5年半的“重庆大轰炸”。1939年，广州、长沙、武汉、太原、归绥（今呼和浩特）以东大片国土被日军占领。仅存经济十分落后的“西部”地区，成为了我国抗战的“大后方”。长期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对于我们国人来讲，拼的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战术和政治上的较量，也是经济与物资保障。

我国东部广大地区，特别是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太原等大城市大商埠，历来是国家“税源”之地。1939年，当武汉以东大片国土落入日寇手中后，抗战的财政新税源何在？“中国要坚决地继续打下去，今后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收税？”成为能不能“坚持抗战救亡到底”的课题之一。

要坚持抗战，前方需要武器、粮饷、运输、通讯、医疗救护等；后方要保障民生、要建设、要办工厂、要内政外交，这些哪一样少得了钱？

抗日战争顽强地打了两年后，当1939年到来时，“坚持抗战不能不花钱，到哪里去还能再多收一点税款？”这一问题摆在了大后方所有坚持抗战的中国人面前。

1939年之前中国历代政府的财源中，最稳定的收入为盐税、茶税、铁税和金银开采等。“国难时期教育方案”的起草者、法学家郭有守，1938年任四川教育厅长，他丰富的学识使其深谙“救亡与税源之道”。1938年4月，孙

明经刚从南京撤退到重庆，就立刻被安排到四川富顺县的自流井地区和荣县的贡井地区考察拍摄。这两个县的产盐量和盐税收入十分可观，历来占全四川份额的70%以上。孙明经的考察成果，有电影、照片和文字考察报告。科考电影《自贡井盐》成功拍摄，放映后使人们对自流井和贡井地区的盐业生产与税源一目了然，更加坚定了抗战决心。另外，当时四川并无“自贡”这一地名，自流井和贡井分别属于富顺县及荣县，《自贡井盐》的广泛放映，对“自贡”这一地名的产生，也起了不小的影响。

1939年，作为大后方最大“教育区”四川的教育经费极度紧张。身为四川教育厅长的郭有守，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汉藏各民族共同培育发展了两千多年的“茶马贾道”的“税源”。

在郭有守的提倡和推动下，以资源委员会和四川省教育厅的名义，在“茶税救国”理论框架下，以各种名目成立的川康考察团、考察队有十几个，他们在1939年1月“西康省”正式建省的前后纷纷启程西行。

当时负责抗战物资总调配的资源委员会官员钱昌照（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在经历了十几批次失败的“茶马贾道”考察后，与郭有守共同决定，由郭有守亲自组建一个高规格、大规模的考察团，对“茶马贾道”沿途税源与资源再做一次深入细致的考察。

此考察不仅需要高层次的学者群体参加，也需要大量经费。郭有守与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找到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杭立武。杭立武是陈裕光的妹夫，时任“中英庚款董事

会”执行董事和总干事，掌管中英庚款的调度使用。对于郭有守“要钱”考察的要求，杭立武很快就同意了。这样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学者层次最高的“中英庚款川康科学考察团”成立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地十几所大学的40多位著名学者，应邀于1939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陆续赶到西康省雅安市报到，并在雅安组成多个专业组，分头开始西进考察。

1939年的孙明经，虽然年仅28岁，却已独立拍摄了30余部“国情调查电影”。他是蔡元培、陈裕光、郭有守、魏学仁等为“结束我国没有电影高等教育专职教师的历史”，刻意挑选并共同培养的我国第一位电影高等教育专职教师。

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在决定安排孙明经对“茶马贾道”进行考察前，多次组织多学科的学界领袖帮助孙明经进行考察规划，提出诸多考察题目。

例如“茶马贾道”源头雅安是大熊猫故里，要对大熊猫进行拍摄

考察；

例如雅安为何会成为“茶马贾道”唯一的源头和起点？要进行“过去时”与“现在时”进行拍摄考察；

例如在“茶马贾道”的源头和沿途，要对所有抗战使用的资源税源与潜在的资源税源及未来前景，要有拍摄考察；

例如，“茶马贾道”源头与沿途的“人力资源”以及“教育状况”及“未来人力资源素质”的状况，要进行拍摄考察；

例如对“茶马贾道”的“古道”与“今道”的具体道路与交通状况，要进行拍摄考察；

例如要对“茶马贾道”源头与沿途的吏治状况与社会面貌进行拍摄考察；

例如“茶马贾道”上的茶从种植到加工，从运贮再到贸易、税收等所有环节，都要有拍摄考察；

例如“茶马贾道”源头与沿途的民情、民俗、民风以及民族、宗教等要有拍摄考察。

为何对“茶马贾道”的考察除

要“用脚踏、用脑思、用口问、用笔记”之外，还专门派遣孙明经去用电影拍摄和照片拍摄来考察？1939年是物资条件最为艰难的时期，在电影人因为没有电影胶片无法拍摄电影，只能演出话剧的情形下，钱昌照、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等却一次拨给孙明经电影胶片12000英尺、照相胶卷200个，这是因为当时只有电影和照片才能让大后方的官员、学者及广大军民切实看到“茶马贾道”上那些能足以长期支撑抗战的税源与资源。

为使这次考察得到刚成立的西康省省长刘文辉的理解与支持，考察团定名为“川康考察团”，考察团集合与誓师出发地也确定在刘文辉的常驻办公地雅安。孙明经不负众望，不辱使命，一路风餐露宿，还常常不惜冒死独行，在原定考察路线仅达半途即遭遇“兵灾”时，面对考察团半途折返，他毅然独自继续前行，实际考察里程超出原定计划近千里。

三

“茶马贾道”的几种称谓

所要考察的“茶马贾道”历史悠久，路途遥远且地域辽阔，对于世代生活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孙明经来讲，这条道路异常生疏，加之掌握着那么多珍贵胶片，出发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幸运的是，经钱昌照、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等召集的几十位学界领袖将其希望研究与需要实地考察求证的问题都交给了孙明经，他用4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1939年6月，在他带摄影器材从重庆出发时，已经

有了一份详细的考察电影的拍摄提纲。

对于孙明经来讲，“茶马贾道”是个什么样的“道”，是一个必须用电影胶片和照相底片来解答和记录的课题；“茶马贾道”名称的由来、内涵，则是第一个让孙明经感兴趣的问题。

既然名为“茶马”，这条道路必然与“茶”和“马”相关，必然与“茶”和“马”的人、事、史、俗、吏治、贸易，特别是“路”的状况、面貌、沿革以及路的管理与因路而生的各种税收、物产相关。

学者们给予的答案，是这条路因“茶马互市”而生，古来名为“茶马市道”或“茶马贾道”。一是“贾”字与“古”字同音，二是这种“茶马互市”的商道，存在的历史已经很久远。到后来，尤其是当时大批美国人通过这条路到达大渡河以西地区后，便多称其为“茶马古道”。其实，在1939年，中国的学者仍多称其为“茶马市道”或“茶马贾道”。孙明经认为“这条有记载从西汉汉武帝时期已经大批用边茶市藏马至20世纪初至少已经存在两千多年”的道路，对于当时建国还不到二百年的美国学者们，会坚持称其为古道，很自然。我们中国已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学者不以两千年称古，也属自然。今天我们大家人人叫做铅笔的笔里边并没有铅，大家都这样叫了，明明与铅无关的笔，也就正式名为铅笔了。这一条路两千多年来明明是贾道的道路，现在不仅我们很多中国人自己称呼它古道，连洋人学者都叫它古道了，已经历时两千多年的道路，叫它古道也无不妥，叫它贾道则属正宗”。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把“茶马贾道”听成或说成“茶马古道”，是“白字先生”把“贾”字误听成“古”字所致。

何为“茶马互市”？学者们的答案是，自有文献记载的西汉以来，把以今雅安市为中心的“川西”地区（1939年时称“康东”，即西康省东部地区）出产的“边茶”，运到“打箭炉”（1939年1月始名为“康定”），在“打箭炉”汉族茶商用茶和藏族茶商用产自藏区的马进行交易，这种以茶市马的贸易称为“茶马互市”。

因此，“茶马贾道”，自西汉时期以来就分为两部分或两大段：一部分在“打箭炉”以东。源头为今雅安市，终点在“打箭炉”（康定），此为“茶马贾道”的东段。在此段内茶的名称为“边茶”或“康茶”；另一部分以“打箭炉”（康定）为源头向西，为“茶马贾道”的西段。西段又分为东道、北道、中道、南道四路。经过藏族茶商在“打箭炉”的“锅庄”内，将“边茶”再加工，从此易名为“藏茶”。藏茶从此地分为

东、北、中、南四路，跋涉千山万水深入康、青和藏区，成为这些地区以藏民为主的居民“酥油茶”的主要原料。

1939年时学者们对“康”的解释为“边地”的古称。今天的川西地区，对于秦汉时期的“中原”而言即为“边地”，因此，以雅安为中心的川西（“康东”）地区出产的茶叶名为“边茶”或“康茶”。

四 “茶马贾道”打箭炉以西 贾道简介

今天的康定，因一曲《康定情歌》而名扬世界。而1939年1月以前，康定称为“打箭炉”。“打箭炉”为藏语音译，意思是两河汇流处的商贸集散地或大商埠。有人不知原委，附会为因诸葛亮命人在此造箭而得名，此说虽误，但流传甚广。

打箭炉是一座小城，所有从此西运的“藏茶”，均要先出北关办理“税引”后才能起运。

东道——从打箭炉北关出发，

向北经八美转向东北，终点丹巴。

北道——从打箭炉北关出发，经八美向西北，经道孚、炉霍、甘孜，越雀儿山口，经青海玉树，终点格尔木。

中道——从打箭炉北关出发，到达甘孜后西行，至德格转西南，渡金沙江，途经西藏的昌都，再西行到达终点那曲。

南道——从打箭炉北关出发，一路西行至雅砻江东岸雅江渡口，渡江后经雅江，西行经理化（今理塘），再西行翻越沙鲁里山，经过义敦（今措拉）再南下抵巴安（今巴塘），再南下渡金沙江西行，一路经西藏的芒康、八宿、波密、林芝，终点拉萨。因这一地区的藏族等居民“贾茶”的货币基本已不是马，拉萨以西、以北的贾道不再称为“茶马贾道”。从打箭炉改装而成的藏茶，到达拉萨后仍能继续远行至“古格王国”旧地扎达和波林，甚至更遥远的噶尔、日土。但这些地区人口不多，销量有限，路途遥远使成本上升损耗增加，价格优势不及“就近”的印度茶。

五 茶马互市中的茶与马

孙明经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得知，汉武帝为和匈奴作战，需要能适应在蒙古高原地区作战的马匹，产自中原的马匹不适应高原气候，而产自金沙江两岸牧区的马匹，适于高原气候，且性烈善战，数量又多，价格也相对低廉。长期世代生息于金沙江两岸的居民，由于长年吃肉饮奶，身体需要“发酵茶”中的成分来中和平衡，因此，对出产